



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智库论丛

上海市文教结合“高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出版工程”资助项目

上海市重点图书

中国农村 基层治理研究

胡 兵◎著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2014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底层抗争与基层治理：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秩序的变迁(14YJC840012)

2015 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

从抗争文化到治理逻辑：我国基层社会秩序的变革(2015BSH005)

中国农村基层治理研究

胡 兵 著



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 上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农村基层治理研究 / 胡兵著. —上海: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5628-4731-1

(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智库论丛)

I. ①中… II. ①胡… III. ①农村-地方政府-行政管理-研究-中国 IV. ①D6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60035 号

策划编辑 / 刘 军

责任编辑 / 秦静良

装帧设计 / 戚亮轩

出版发行 /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 上海市梅陇路 130 号, 200237

电话: 021-64250306

网址: www.ecustpress.cn

邮箱: zongbianban@ecustpress.cn

印 刷 / 江苏省句容市排印厂

开 本 /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 15.25

字 数 / 305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6 年 8 月第 1 次

定 价 / 6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中国农村基层治理一直是近年来农村社会学研究的重要主题。我的学生胡兵也是这批研究队伍中的一员,他自攻读社会学硕士研究生开始就坚持长时期的田野调查,其博士学位论文便是关于农村社会秩序方面的内容。参加工作之后他仍然保持着勤奋的求学态度,继续进行农村社会学研究,本书是他长期研究的成果。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在中央文件中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这也是中央正式强调治理的核心价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革、内生性演化的结果。这在农村治理中体现得尤其明显。与城市相比,农村拥有更多的传统资源和文化规则,这些差距使得城市与农村社会治理差别较大。而频发的农村社会问题迫切需要提高农村治理能力,甚至可以说,农村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

胡兵博士的这部著作,以国家与社会关系为分析框架,以底层抗争、基层治理及其互动关系为分析视角,通过对华中 Z 镇农民抗争事件的实证考察,试图把握我国农民日常生活的秩序,揭示底层民众抗争行动的基本逻辑以及基层治理的制度性缺陷,检讨抗争与治理互动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为我国乡村社会良好秩序的构建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我认为,本书通过对经验性材料的分析和研究,获得了两个有价值的发现:

一是我国农村底层抗争的“递进模型”。作者认为,底层抗争发生的三大要素,即侵权认知、抗争文化、抗争策略,在抗争行动中是一种递进关系,

前者是后者形成的基础。在三大要素中,侵权认知是抗争行动发生的首要基础。底层群体之所以会做出抗争的行动,首要原因在于认知到自身的利益受到了“侵犯”,且是不合理、不合法的侵犯。抗争文化具有“催化剂”的作用。温和的抗争文化是一种负催化剂,会促使抗争者心平气和地放弃激烈对抗的方式,转而寻求其他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而“对抗性”文化则“加速”抗争者做出抗争的决定,促使底层民众一遇到困难便首选对抗作为诉求的主要渠道。抗争策略是抗争行动的具体表现,是底层民众选择温和的抑或激烈的方式以实现抗争目标的技巧和步骤。

二是我国农村基层治理的“内卷化”趋势。作者发现,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政府及基层组织在治理过程中主要在消解抗争策略上下功夫,突出表现为强调“维稳”。这种“维稳”的目标不在于谋求解决抗争行动背后的原因,不在于通过提高治理效率来解决抗争问题,而是靠上级的重视、压力和工作经费的持续增加来体现“维稳”的绩效。这就使得基层治理愈益呈现“内卷化”的特征和趋势。作者认为,要解决基层治理这种低效率的“内卷化”问题,有三条途径:一是重视“维稳术”,通过技术治理,力争将每一起抗争事件纳入依法治理(法治)的轨道加以解决;二是引导抗争文化,剔除其“对抗性”,由“零和博弈”转向“正和博弈”;三是切实扩大农民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渠道,帮助农民选择抗争之外的合法途径来达到利益诉求的目标。

通常我们都认为,经济因素引起的侵权认知是抗争行动的主要变量,但本书作者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发现,抗争行动中抗争文化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对于基层政府及有关基层组织而言,为了实现健康有效的基层治理,不能仅仅停留在“维稳”的策略目标阶段,而是需要准确把握抗争行动发生的规律和逻辑,立足社会正义与社会和谐的角度,有针对性地消解和引导抗争文化,重新塑造底层对“侵权”的认知,将他们的抗争行动纳入法治的轨道,依法解决抗争行动的原因。换言之,重视抗争文化在底层抗争行动中的作用,可以促使基层政府更有针对性地采取应对策略,切实降低或减少农民感受到的侵权认知,有效构建政社之间、干群之间良性互动的共同体关系,进而实现健康和谐的乡村社会秩序。

本书作者胡兵一心向学,勤于思考,在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走上工作岗位后,继续潜心农村社会学研究,并攻读了博士学位。在博士毕业后的几年时间里,继续拓展相关领域研究,并不断充实研究材料,形成了这项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研究成果。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作为他的导师,对于他勤奋刻苦的求学态度和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我由衷地感到欣慰,同时愿意向大家

推荐。当然,本书的一些内容和观点,还有一些需要进一步斟酌和完善的地方,希望能获得同行的支持,为中国农村基层治理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但愿胡兵博士能把本著作出版作为一个新的开端,继续深入研究,取得更大的进步!这也是为师者的最大心愿。

特此为序,以飨读者。

华东理工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应用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上海高校智库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研究院院长

徐永祥

2016年3月于华东理工大学

目 录

引子:底层抗争与“浮头泛塘”	1
第一章 导论	3
第一节 选题缘起	3
第二节 研究意义	5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分析框架	7
第四节 核心概念	16
第五节 研究方法	20
第二章 文献综述	29
第一节 有关底层社会的研究述评	29
第二节 有关底层抗争的研究述评	32
第三节 有关农民抗争的研究述评	39
第四节 有关基层治理的研究述评	48
第三章 结构性差异:底层抗争的基本要素	53
第一节 Z镇经济与社会结构性差异	54
第二节 底层抗争的基本要素与逻辑关系	62
第四章 侵权认知:底层抗争的意识要素	67
第一节 侵权的历程	68
第二节 认知的转变	75
第三节 心态的演变	80
第五章 抗争文化:底层抗争的话语要素	89
第一节 地域文化中的民风民俗	90
第二节 农村场景中的抗争行动	94
第三节 抗争行动塑造地域文化	105
第四节 抗争文化中的“抗争性”	108

第六章 抗争策略:底层抗争的行动要素	113
第一节 抗争策略的历史演变	115
第二节 抗争策略的几种范式	119
第三节 抗争策略的“伦理”与“意外”	131
第四节 抗争策略的宏观背景	135
第七章 基层维稳:底层抗争的治理要素	140
第一节 “维稳”意识的演进过程	141
第二节 “维稳”政策的演进过程	143
第三节 基层政府的“维稳”逻辑	149
第四节 “危机”意识与治理策略	167
第八章 建构和谐:基层治理的文化要素	170
第一节 政治参与视角下的抗争文化	171
第二节 抗争文化与抗争政治	176
第三节 底层抗争与基层治理的互动	180
第四节 构建和谐的抗争文化	185
第九章 公正社会:基层治理的政治走向	189
第一节 底层抗争的缘由	190
第二节 公正社会的维度	194
第三节 公正建设的内涵	200
第十章 结论与讨论	208
第一节 简短的结论	208
第二节 进一步的讨论	211
第三节 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发展	214
第四节 研究的创新与拓展空间	215
参考文献	218
后记	234

引子：底层抗争与“浮头泛塘”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荀子·王制》

中原地带，村庄一般坐落在有水的地方，几乎每个村庄就有一个池塘。每逢过年，家家户户便会分到从池塘中打捞的鱼，俗称“分年鱼”。这是村庄集体的一项福利。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乡村秩序的重组，集体经济的弱化或解体，“分年鱼”的传统随之也丢失了。不仅如此，伴随着乡村经济、政治、社会秩序的重组与变迁，农民的抗争事件也越来越多的。^①

仔细思考后不难发现，村庄中抗争事件的发生逻辑及治理方式与池塘养鱼颇有相似之处。池塘鱼儿一般不需花费精力去喂养，村里养分自然会流入池塘。但有些时候，鱼在缺氧的情况下会出现“浮头”，稍不注意就会发生“泛塘”现象，造成鱼的大量死亡。这种“浮头”现象就好比村庄中出现的“抗争事件”，要进行治理就需要找到“浮头”的原因。鱼儿浮头有轻重之分，一般在池塘中间的浮头为轻浮头，发展到四边的为重浮头；听到声响就下沉的为轻浮头，没办法下沉的为重浮头。因此，如果池塘中间发生浮头现象，需要立即采取有针对性的、恰当的措施。在最初没有找到造成浮头的原因之前，渔民一般会划船到池塘中间看看，船桨带来的震动和声音恰好可以缓解浮头现象。渔民或者将浮头的鱼儿捞出来，这就好比仅仅根据抗争事件来进行治理，这就是“维稳”的思维，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过段时间后，池塘又会出现浮头现象，如同抗争事件越来越多；后来发现造成浮头的原因在于鱼儿缺氧，因此需要在池塘里输入氧气，怎么做呢？最快的方法是撒些增氧剂，快速增氧，缓解池塘鱼儿浮头的症状；但这毕竟

^① 抗争事件是指一个或数个农民，因某些矛盾向基层政府或表达诉求和主张，或直接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或发泄不满制造影响，因而对社会秩序造成一定影响的各种事件。

不是长久之计,时间允许的话,需要配备增氧设备,持续地对池塘增氧。这就相当于针对抗争文化采取的措施,如“和谐话语”能有效地对抗争事件进行治理,也如向农村地区输入一些资源,如农村合作医疗、大学生村官等措施。但须知仅仅增加氧气还是不够的,需要找到池塘缺氧的原因,否则即使一味地增氧也难以根除“浮头”现象。

一般来讲,缺氧是由于水质问题造成的,需要对水质进行养护,每年村庄都会将池塘淤泥清理出来,防止池塘养分过多,造成水质缺氧,也有可能因天气过于闷热造成水质缺氧。农村税费改革便相当于对农村地区进行了“淤泥清理”,能够维持一段时间的村庄秩序。那么浮头为什么多发生在池塘?因为池塘的水是缺少流动的,鱼儿没有别的去处,就容易出现“浮头泛塘”。要彻底解决池塘中的鱼儿“浮头泛塘”的问题,就需要从池塘本身下功夫,使池塘的水流动起来,变成大水库,或者与流动的河流联结起来,这样就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浮头泛塘”了。这就是本书提出以“公正”来彻底根除抗争事件,进行国家治理的原因。

“大禹治水”的美丽传说在中国妇孺皆知。在农耕社会,水对农业有着重要的意义,水对农民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农民们往往围水而居,在华中地区,有村庄的地方就一定有水源,因此,池塘对传统农村的意义非常重要。如何处理与水的关系成为人类与大自然关系的重要内容,“治水”不仅成为政府的重要任务,也是广大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荀子曾在他的不朽著作《荀子·王制》篇中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意思是说,统治者像一条船,而广大民众犹如河水,水既可以把船载负起来,也可以将船淹没掉。唐贞观后期,魏征在著名的《谏太宗十思疏》中说:“怨不在大,可畏唯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意思是说,怨恨不在于大小,可怕的只在人心背离。水能载船也能翻船,所以应该高度谨慎。以水喻百姓,既体现老百姓的复杂性,也体现老百姓在政治中的地位。在抗争事件中,老百姓或者说农村也同样既重要又复杂。本书以“浮头泛塘”来比照抗争事件或许不太恰当,但说明了一个朴素的道理:浮头与增氧的关系如同抗争与治理的关系,需要“对症下药”,否则,浮头之后就容易“泛塘”了。本书关于当代中国农村基层治理的研究旨在辨明底层抗争与国家治理的关系,既着眼于问题意识,又努力寻求结论以更好地解决问题。我想,这也是社会学经世致用的学科意义之所在吧。

第一章 导 论

“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

——卡尔·马克思^①

第一节 选题缘起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一书风靡之时,寻找重要年份(如万历十五年)就成为学者和知识分子的“时髦标志”。在中国的历史上,“三十年”周期似乎成为一个定律。1919年的五四运动、1949年新中国成立、1978年改革开放,似乎每隔30年,便是历史上的重要年份。而2008年,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南方雪灾、汶川地震、经济危机以及北京奥运会,给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带来了大悲大喜。在这中间,也发生了“6·28”贵州瓮安事件,“7·19”云南孟连事件,“11·3”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11·17”甘肃陇南事件,“12·25”广东东莞劳资纠纷事件等。这些群体事件的出现,似乎掀开了中国波澜壮阔改革下所掩盖的隐蔽的一角,在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背后,仍然存在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即底层社会及其抗争问题。

笔者在2007年完成农民工的生存行动研究课题^②之后不久,骤然发现,这一领域尤其是群体性事件在2008年之后受到了空前的关注,我所观察到的是,随着近年来底层社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抗争,和谐语境掩盖下的底层社会问题逐渐浮出水面。“改革进入‘深水区’以后,大家才发现,所有被小心

^① 卡尔·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页。

^② 胡兵:“可行能力剥夺下的农民工生存行动及其对策”,华东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翼翼绕开的问题,最后形成了一种滞后效应,累积成今日无法避开的社会矛盾”。^①“在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政治化的话语往往掩盖了复杂生猛的社会现实。意识形态主导下的诸多话语,空泛、虚妄、浮华,严重脱离社会生活。充斥在报纸电视上的这些话语,与基层社会生活真实状态严重脱节。因此,底层研究在中国需要张扬”。^②尤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自乡村、继而城镇以信访和群体性事件为主要表征的社会冲突日益频发,近几年,群体性抗争事件处于高发期,折射出当前社会稳定状况堪忧的一面,特别是农村的社会稳定状况,无论是官方(连续多年中央一号文件关注“三农”问题)还是学界(“三农”问题研究学者)对此都非常重视。当前,对于底层社会的关注已经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其现实关怀吸引了越来越多年轻学者的加入。

我们知道,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农民的终结”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一个伪命题,仍然需要农村发挥“稳定器”与“蓄水池”的作用,农村社会的运行状况是关系到国力强盛、国家发展乃至长治久安的重要因素。然而,与20世纪上半叶毛泽东等领导的土地革命和晏阳初、梁漱溟等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不同,新时期的新农村建设面临着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环境,抗争事件频发、治理陷入困境,如何理解这些变化、把握这些变化?为此,国内学术界已经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例如,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译林出版社等机构先后出版了数十种西方学者的有关论著,引入西方的话语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先后举办了“集体行动与社会运行研究讲习班”(2007年)、“政治社会学(社会运动)工作坊”(2011年),搭建了国内学者共同探讨研究社会运动(抗争政治)的平台;还有《社会学研究》与《社会》等著名期刊连续刊发多篇有关抗争行动的学术论文。值得一提的是,许多“三农”研究学者(如以“村治”系列研究著称的“华中学派”),走进田野,通过对一个个村庄的“深描”或“厚描”^③,揭示农村社会的种种面相及治理的现状,他们还培训了一大批以农村研究为志向的学生加入中国农村研究的团队中。然而,不无遗憾的是,关于中国农村研究的著作尤其是关于农村的经验故事及个人解读等作品虽然汗牛充栋,颇有大历史学家傅斯年所说的“史学就是史料学”的味道,但对其深入分析的作品却不多,难免让人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惑。有鉴于此,笔者试图通过解剖“麻雀”来深入考察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秩序的成因及走向。具体而言就是,结合对农村生活现状尤其是抗争事件的“深描”,弄清楚农村底层社会的抗争行动是如何形成的?相关的治理如何化解这些抗争乃至彻底改变抗争形成的根源?换言之,抗

① 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② 赵树凯:“底层研究在中国的应用意义”,载《东南学术》2008年第3期。

③ 吉尔兹:“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载邓正来译,梁治平编《法律的文化解释》,三联书店1994年版。

争是如何改变乡村秩序的? 治理又是如何影响乡村秩序的?

第二节 研究意义

关于农村社会秩序的变化,可以依据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税费改革这三个重要节点划分,其发生的变化是显著的。对于这些变化,不同的研究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观察和分析。而笔者所关心的是,农村社会秩序分别受到抗争行动和基层治理的哪些影响,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应该朝着哪个方向发展? 这是笔者希望从抗争政治和基层治理两个视角观察农村社会秩序变化的原因。

一、理论意义

从理论层面来看,首先,本书采用参与的方法,力求展示底层社会中抗争事件与基层治理互动的图景,分析社会秩序变化的轨迹,从而为该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打下基础。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学术界对于乡村秩序的变化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对于如何治理抗争,促使从抗争到不抗争转变的经验研究还相当少。笔者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唤起学界对这一研究领域的关注。

其次,本书从抗争政治和基层治理两个视角观察农村社会秩序,分别从“底层凝视底层”和“向下看底层”两个角度着手分析如何更好地促使社会秩序发生变化,发生怎样的变化。本书特别强调在抗争行动中抗争文化所起的作用。抗争文化可以促使底层农民把握抗争行动的机会,从中获得利益;官方也可引导抗争文化发生积极功能,促使农民在日常生活的规范上大胆创新,走自下而上行动致富之路。我们知道,当前的抗争行动研究是学界关注底层社会生活的重要部分,而这一领域又涉及非常丰富的基础理论层面的问题,本书试图将从抗争行动到抗争文化这一现象理论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底层社会抗争研究的转向,为该领域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再次,本书试图综合宏大叙事和过程叙事。我们知道,因为研究对象过于复杂,我们不可能归纳出一个对任何抗争事件都能进行指导性解释的模型,所有在这方面的努力都是走不通的;但是,一个跨时空宏观的解释框架对于这方面的研究颇有意义,这也是许多学者热衷于宏观理论研究的原因。笔者自知才疏学浅,不敢奢求进行这方面的探索,只是努力寻找途径,尝试对复杂对象进行简单解释。因此,本书试图有效关联微观行动与宏观结构的关系,即农民不同的抗争形式对应着不同类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尝试对现实社会中复杂对象的某些方面或某些角度做一番解释。笔者相信,随着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逐步建构,农民抗争的方式也必将会有新的趋势:他们的抗争行动可能是国家与社会关系变化的动力之一,国家的治理方式也同样能够引导农民选择合适的抗争策略,以维护和争取自己的权益。所以说,对农民抗争行动和基层治理的研究,有利于窥探社会变迁的大体走向。这也是社会学研究所追求的最终目的之一。

二、现实意义

孟德拉斯曾经指出:“20 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在 20 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①托尼也说过:“有些地区农村人口的境况,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于灭顶之灾。”^②这些话在当前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出现断裂和失衡现象的今天,越发引起人们的深思。当前的农村研究需要我们走进底层去体验农民的生活,从越来越多的抗争事件中感受他们的生活所经历的变化,感受他们的社会秩序所经历的变化,然后采取相应的措施让他们的生活更美好,让社会更和谐。

因此,从现实性上说,首先,农民作为一个阶层,更多的是处于松散的状态,或处于碎片化的环境,在贫富差距愈来愈大的背景下,缩小两极分化已经成为政府努力的目标。笔者对底层社会的抗争行动历程和生活经历进行描述与分析,尤其是对 Z 镇农民生活状况进行“深描”,力求唤起精英阶层对底层社会——既在绝对的意义上,也在相对的意义上——日益恶化状况的关注,目的是促使社会减少对农民合法利益的剥夺,对农村进行积极有效的治理,这可以在对分配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之前(即不影响社会效率的前提下,做到更加公正),缓和贫富差距,进一步维护社会稳定。

其次,近年来,农村地区抗争事件的频发,尤其是“社会泄愤事件”的出现,让人们对农村社会的秩序产生了怀疑,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大背景下,政府对抗争事件是持谨慎态度的。我们知道,稳定并不是社会不发生抗争事件,而是国家能够将这种抗争事件(社会冲突)体制化,从而消除社会发生大规模的、有强烈破坏性的动乱的可能性。本书对农村社会秩序的详细描述,一方面让农民从抗争事件和基层治理过程中学会应对,获得利益;另一方面,通过对基层治理的分析,确保在建立民主国家的过程中,不断地将社会发展把握在可控的范围,减少社会动荡和分裂,这也正是提高政府执政能力的根本要义。

再次,笔者在研究路径上,指出如何促使底层行动者将抗争的诉求对象

① [法]H.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 页。

② 转引自[美]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译林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 页。

由其他群体转向自我群体,利用自身对生活的“抗争”行动获取利益,从而向上流动,这一过程改变了当前乡村的秩序。当前底层社会问题颇多,寻求解决的渠道也大多呼唤自上而下的治理方式,本书在保持这一视角的同时,提出将抗争转化为自下而上的视角,寻找抗争行动与现有体制的契合,以便更好地为政府部门提供一定的决策参考。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分析框架

一、研究视角

笔者以底层抗争、基层治理及其互动关系为分析视角,通过对华中 Z 镇农民抗争事件的实证考察,试图把握我国农民日常生活的秩序,揭示底层民众抗争行动的基本逻辑以及基层治理的制度性缺陷,检讨抗争与治理互动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期为我国农村社会良好秩序的构建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1. 底层抗争视角

关于底层社会的集体行动或群体事件的研究众多,西方学术界也有颇多关于革命、社会运动、集体行动或抗争政治的文献,笔者采用“抗争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来统摄相关概念。底层抗争视角,即自下而上观察底层群体为什么抗争,怎样抗争?诸多学者已经总结出“生存逻辑”“以法抗争”“以身抗争”“依势博弈”“边界冲突”等等诸多解释框架。本书根据赵鼎新分析社会运动采用的三个“巨型机制”——变迁、结构和话语,在此基础上确立底层抗争的意识要素、话语要素和行动要素,以侵权认知、抗争文化、抗争策略作为底层社会抗争逻辑的三大要素。侵权认知作为结构原因,也是农村发生抗争行动的根源;但往往意识到遭受侵权也不一定会起来“反抗”,决定是否反抗的关键因素就是其平时的地方性知识结构、规则意识及怨恨意识等,这些因素本书称之为抗争文化,作为抗争行动发生的话语要素;一旦决定要起来抗争了,那么采用何种抗争方式或采用何种更加有效的抗争方式呢?这便归因于抗争策略的因素了,本书称之为底层抗争的行动要素。于是,抗争事件发生了,能够引起抗争群体之外人们的关注和反应,尤其是抗争对象的反应。这就如同缺氧的鱼“浮头”一样,引起养鱼人的关注。这三大因素的关系如图 1-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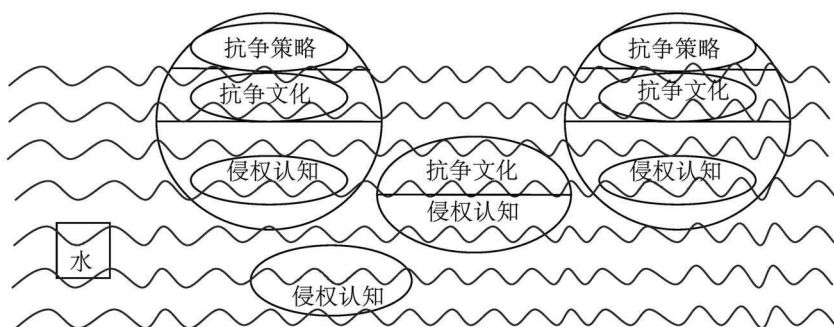


图 1-1 底层社会抗争逻辑

通常来讲,抗争事件的发生并不是孤立的,往往在同一时间会有不同的抗争事件出现,就如同池塘的不同地方出现鱼儿“浮头”一样。显然,“鱼儿”以何种方式浮头不是我们最为关注的焦点,而需要关注的是鱼儿为什么会浮头?哪种鱼儿会出现浮头?所以,我们要关注哪些群体会进行抗争以及发生抗争的共性原因。抗争策略的不同选择可以区分抗争群体的类型,抗争文化的不同可能决定选择不同的抗争策略,而侵权认知则是抗争文化形成的基础,同样的侵权在不同的地域由于不同的认知形成不同的抗争文化。这便是笔者以底层抗争为视角,对抗争逻辑三大因素进行“深描”的原因。

2. 基层治理视角

显然,抗争事件的浮现其实就如同“冰山”一样,浮出来的只是一角,其话语要素和结构要素中涵盖的事件更多,因此要求基层治理不能仅仅针对“浮头”,而是要根据话语要素和结构要素来采取有效的措施,否则这些因素终将浮现出来,使得社会秩序陷入混乱。

本书的治理逻辑对应着抗争逻辑的不同要素。就治理而言,抗争事件尤其是群体性事件的出现,是社会稳定的隐患;对基层政府而言,在社会稳定局面上的失控将导致其政绩被一票否决。因此,基层治理初级阶段就是不惜一切代价维持社会秩序,确保社会安定。所以,治理逻辑的第一步便是维稳,以消解抗争策略。如孟连事件、瓮安事件、增城事件、织里事件等,由原本只涉及相关部门的个体事件发展成当事人与非利益关系者共同参与的群体性对抗,其直接原因就在于维稳的水平上。维稳要找准问题的原因,鱼儿“浮头”一般是因为缺氧,需要撒些增氧剂或配备增氧设备,而不是驱赶。维稳,要站在群众利益的角度,并不是任何矛盾冲突或诉求表达都会影响全局的“稳定”。维稳,不是权力维稳,而应是权利维稳,是以保障基层民众权利为基础的维稳;不是静态维稳,而应是动态维稳,是“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维稳;不是强制维稳,而应是和谐维稳,是围绕群众所急所盼、所忧所愿充分协商的维稳。

治理逻辑的第二步是以和谐话语导引抗争文化。在农村,地方性知识或规则是长期以来慢慢形成的,是农村维持日常秩序的重要依据,虽然在农村推行了“送法下乡”等系列措施,农民们仍然更多地依据村庄道德进行判断,形成了某一地域的抗争文化,如经常所说的某地“民风淳朴”或“民风彪悍”,便是这种抗争文化的真实写照。自上而下的政治话语,尤其是当前“和谐”话语的宣传,要主动契合并导引当地抗争文化,建立起干群之间的信任关系,形成基层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良好互动,建立良好的地域共同体,促使民风从彪悍走向平和。这就相当于为池塘清理了一遍淤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鱼儿缺氧事件的发生。

治理逻辑的第三步是以公平理念颠覆侵权认知。国家的重要职能之一便是增进公平,公平也是底层民众一以贯之的诉求,从陈胜、吴广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开始,底层民众始终盼望着公平,盼望着能改变自己身处底层的命运。而如今,社会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阶层之间的流动减少,因此,民众日益呼唤一个更加公平的流动机制。这就相当于给池塘注入活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江河里的鱼一般不会出现“浮头泛塘”现象,如果让水流动起来,鱼儿能够自由地在更大的范围流动,也就不会发生缺氧现象,更不会有“浮头泛塘”的事件出现了。

二、研究思路

大范围抗争事件的出现,首先是因为宏观环境,即侵权认知。从古至今,农民一直遭受着侵权并逐渐形成了自身的认知,这便是抗争行动的宏观背景。其次是通过对此种认知的反思,形成了中观环境,即抗争文化。最后,决定“行动”了,才会展现抗争行动的种种方案策略,期待达到自己的目标,这便是微观行动。这三个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由远及近的因素,便构成了底层抗争的完整图景。

针对底层抗争的基层治理是“事件-反应”模式,它的步骤则是“由表及里”,从微观到中观再到宏观,首先是针对各种抗争策略的维稳行动,通过各种方式消解抗争策略,将抗争转化为体制内的妥协与合作,确保社会稳定。其次是运用政治话语对抗争文化进行导引,发挥抗争文化的积极功能,使底层社会获得更多的机会来补偿所遭受的侵权。最后是建立更加公正的社会,尽可能地消除对底层群体的侵权,使其长期以来形成的侵权认知彻底颠覆,使抗争行动消失于无形,建立一个人人平等、和谐相处的幸福社会。本书的研究思路如图 1-2 所示。